

# 于右任 一个做官的“名士”

在中国近代史上，总有一批人的名字，似乎随处可见，如雷贯耳，但似乎又总不在舞台的最中央。于右任就属于这一类人。

## 知识分子

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于右任后来被称为“国民党元老”，即由此而来。

不过，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之后，于右任没准备“换太平以颈血”，因为对他这样的人来，有比枪和炸弹更拿手也更有效的东西：笔。于右任一手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就是中国报史上赫赫有名的“竖三民”。

于右任善写诗作赋，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字。于右任最擅长草书，有“当代草圣”的称号。1932年，于右任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将篆、隶、草与行楷融会，打通魏碑，自成一家，每一个字都自有意境。

有人来求字，提笔就写，写完盖章，分文不取。于右任写字不看人，也不分贫富，更不会“惜字如金”，以确保自己字的价格。贩夫走卒来讨字，只要于右任喜欢，来者不拒。但如果碰到他不喜欢的人，怎么讨也不给。比如他不喜欢宋子文，宋子文曾专门准备了一个精致的扇面托人请他题字，他就是不肯写。但他在饭馆吃到一道好吃的菜，提笔就给店家写一块匾额，甚至给女服务员也题字。

于右任到了台湾后，很多人都假冒他的名卖字，他的下属知道后表示要“严惩”，但于右任特地关照“不要为

难”他们。一次，他在马路上看到一家商店的牌匾是假冒他的字，就走入店内，让店家摘下牌匾，重新写了一幅，且分文未取。

## 监察院长

办报，写诗，题字，于右任完全就是一副知识分子的样子，但之所以有名，因为他还是个政治家，甚至还当过总司令。

于右任一直追随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右任也随即辞职（回去办《民立报》了），后因反对北洋军阀，于右任担任过陕西靖国军的总司令，也算是书生掌兵了。

从1930年开始，于右任被蒋介石任命为监察院长，从此在这个位置上，一坐就是34年。

监察院是国民党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非常敏感的部门。也正是因此，“监察院长”这个职位，一直迟迟没有归属，直到最终以正直清廉闻名的于右任出任，大家才都没意见。

但在民国的大官场，于右任自己正直清廉是没有用的。于右任上任之初，也曾畴躇满志，放言“苍蝇老虎一起打”，但真打起来，就发现除了能动几个小小的科长或处长，再往上就动不了了。于右任曾想法办贪污的铁道部长顾孟余和财务部常务次长顾翊群，但这个级别的“小老虎”，就已经有上层人物，乃至蒋介石或汪精卫来打招呼了。

所以这个“监察院长”，于右任做得很是胸闷，被人讥笑为“监而不查，查而不明”。他也曾提出过辞职，但蒋介石坚决不准。

## 纸弹敌不过银弹

于右任在官场中表现得最书生气的一次，就是1948年的副总统选举。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参选副总统。他的竞争对手，是孙科、程潜，以及最有实力的李宗仁。各个竞选人为了拉票，对各路投票代表使出了各种手段。

李宗仁给每个投票代表都提供了一辆汽车，配司机服务；包下几个大旅社和酒店，只要是代表，免费入住，免费吃喝。

孙科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程潜是武汉行辕主任，他们也是天天设宴款待各路代表。

于右任呢？啥也没给，在自己屋内摆开文房四宝，只要代表来，就送一幅字。每天上门讨字的代表络绎不绝，最多时每小时有近200人，队伍排得老长。

在投票日前一天，于右任终于给各路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在一家饭店里请大家吃饭。在开席前，于右任说：“我家中没有一个钱，因此，很难对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到了投票日，结果不出意外，于右任得493票，第一轮就被淘汰。冯自由替于右任感慨：“你的纸弹怎么敌得过人家的银弹？”

## 为政治所累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大陆已一溃千里，国共和谈在北京举

行。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原本是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京参与和谈的，但是国民党的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却认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准和谈。

周恩来当时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京，得知他不能来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转告于右任：如果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请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攻破长江，派飞机接先生来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说过一句话：“张治中不应该阻止我去北平！”因为他知道，当时他身边已经被安排了监视人员，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陆了。

于右任没有料错。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国民党经营的千里江防一触即溃。4月21日，于右任被人从南京转移到上海，随后辗转到重庆，最终在11月29日离开大陆，飞往台湾。

但于右任直到去台湾的时候，他的夫人高仲林、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依旧留在大陆。

一家人，从此再也无缘相见。

于右任在台湾的日子，一直都过得很清贫。在大陆时，他捐建学校、赈灾、扶贫，钱如流水一般出去，他眉头都不皱一下。到台湾后，大家一开始的日子都不好过，很多人也会来找于右任借钱。于右任一般能借都借，也不催账。

于右任向来视钱财为身外之物，清贫倒也罢了，关键是过得不开心。政治上，他继续成为台湾当局监察部门的一个摆设，感情上，他和妻女隔海相望，不能团聚。

1964年，于右任因长期郁闷成疾，病逝于台北。

据《历史的温度3》张玮/文

## 陈垣倾力抢救历史档案

陈垣(1880-1971)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后，由当时的社会名流组成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陈垣名列其中。第二年，即由这个委员会筹立故宫博物院，意在清点、保护和管理故宫中的国宝。

很显然，筹立故宫博物院，意味着大量故宫文物将不再为爱新觉罗家属私人拥有。因此，一些清室遗老多方串联，千方百计想推翻故宫博物院。1926年3月，北洋军阀在清室遗老唆使下，以政治压力接收故宫。陈垣毅然站出来，召集博物院全体数十名员工进行抵制。陈垣与北洋政府接收者进行谈判交涉，提出三点要求，大意为：一、故宫文物不能还给溥仪；二、故宫文物不能变卖；三、故宫文物不能毁损。陈垣还提出，对故宫文物必须逐件点交，登记造册。但他的合理要求和建议却遭到对方反对。陈垣毫不退让，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最后竟被宪兵司令部逮捕。

这样的逮捕毕竟缺失底气，加之外界营救陈垣的呼声很高，宪兵司令部不久后只得将他释放。想不到陈垣偏不走，他质询宪兵司令部为何逮捕他，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最后对方干脆将他押送回家，

将他监禁在家里。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曾将原清政府军机处档案随意搬移，缺失保管，十余年来，这些珍贵档案受到严重毁损。直到1929年，许世英出任北洋政府总理，陈垣因为和许是旧识，得以向许直言抢救这批故宫档案事，提出移交故宫博物院许表示同意。出生于1927年，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工读学生、后来成为知名金石文物和清代档案专家的单士元，也曾是筹立故宫博物院的一名年轻员工。他由衷地说，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援师(陈垣字援师)是有大功的人”。

除着力抢救故宫档案，陈垣还重视抢救散落在民间的重要历史档案。北大教员伦哲如曾在琉璃厂买到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档案多册大部分为电报，史料价值极高，其中就有上海“苏报案”档案。1933年左右，陈垣得知这一消息后，说动伦哲如，将端方档案以九百银元转让给故宫文献馆。这批档案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重要馆藏之一。去伦哲如家搬运这批档案时，陈垣曾带单士元一起前往办理手续。单士元深有感触地说：“当日援师若不注意及此，收入公家，则这批档案，亦早已湮没无闻了。”

据《晚清民国谈逸录》陆其国/文